

# 《盛京时报》关于七七事变报道研究

王晓岚 戴建兵

---

---

**内容提要**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七七事变后，该报与日本本土报纸口径一致，声称是中国方面挑起的事端，责任在中国而非日本。该报主编菊池贞二以“傲霜庵”笔名发表社论要求日本迅即出兵“膺惩”中国、扫平华北。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本的新闻宣传家们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自觉地站到了一起，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鼓噪、辩护。但由于失踪的日本士兵不久归队，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临时由士兵失踪改为不法射击，打乱了日本人既定的宣传布署，致使其在战争之初的新闻报道漏洞百出，反倒为我们今天研究七七事变的起因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关键词** 盛京时报 七七事变

---

---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1906年10月18日由中岛真雄创刊于奉天（即沈阳），主笔菊池贞二。中岛真雄脱离该报后，先后由佐原笃介、染谷保藏主持。该报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东北的主要喉舌，受到日本官方的积极支持和满洲铁路公司的津贴。九一八事变后，该报凭借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成为伪满洲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关于大事、要事的报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与日本本土报纸保持一致。如关于七七事变的报道，该报与《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绝无二致。所以，《盛京时报》关于七七事变的报道，是整个日本当时新闻宣传的缩影，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盛京时报》由于地处中国东北沦陷区，所以又带有殖民地的色彩，即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地为日本侵华战争和殖民政策服务；在文化上，腐蚀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

关于七七事变，该报自1937年7月9日开始。这一天，该报第二版在“华兵暴戾对日军行不法射击”为题下、同栏集中了20多篇文章，拉开了卢沟桥事变报道的序幕。

—

1937年7月7日，日军到卢沟桥附近演习，并构筑工事。夜，日军要求入宛平城搜寻一失踪日兵，被中国军队拒绝，遂包围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抗击。这就是七七事变。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战后日本历史学家们做了种种揣测，或说是二十九军将士偶发了第一枪、或说是中国共产党华北地区领导人胡服（刘少奇）指挥人们干的，总之，是中国人发的第一枪，战争的责任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日本人最初的宣传，我们便能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在7月9日的新闻中，我们可以从《盛京时报》中找到这样几则令人疑窦丛生的消息：

在一则题为“对操演中之日本军 华兵横加射击 该事态推移 颇堪注目”的新闻报道中，内有两则急电：

“天津八日急电”七日夜十一时四十分许，华方廿九军对在丰台操演中之日本军横加射击，八日午前四时，两军仍在对峙中，驻丰台日本军当即派遣军使前往交涉，要求道歉，若廿九军到底坚持不逊态度时，须断然膺惩之，现待机中，事态颇堪重视。

“北平八日急电”驻丰台日军部队一个中队七日夜举行夜间演习，在卢沟桥附近，受华军数十发之不法射击，日军立即中止演习，

除侦察情况外,旋向华方部队长要求严重谢罪,至该不法射击之中国兵为冯治安所部之第三十七师。

两则报道都很肯定地说是中国军队开的枪,但究系何人,并未言明。更重要的是,日军遭遇到射击,究竟有无人员伤亡,也未言及,真是急煞了想了解情况的读者!而且,丰台与卢沟桥相去甚远,细心的读者不难提出这样的疑问:驻扎丰台的日军怎么不辞辛苦跑到中国守军警戒线内去夜间演习呢?

这两则消息与同日在该版发表的另一则消息“驻平陆军武官室发表交战原因”还相互矛盾,日本驻北平陆军武官室于8日上午7点发表交战原因说:“驻丰台日军部队七日午后十时许,举行夜间操演,在卢沟桥北方约一公里龙王庙附近由曾在该地新设碉堡配置守备兵之中国军,突然受不法射击,于是日军当即中止演习,集结部队,严重监视华军情况,日驻平部队森田中佐、带同昌平县长王冷斋,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赴卢沟桥,俟现地调查一后,纠明华方不法而拟促其反省,午前五时许抵现地……”这则消息说是晚上10时许日军受到射击,与上则消息中的天津急电“夜十一时四十分许”相去一个多钟头,北京急电说是在卢沟桥附近受袭,而陆军武官室却说是在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附近,两地相去千米,单看这报道,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王冷斋先生并非昌平县长,而是宛平县长。

还是日本外务省搞外交的人说话谨慎,该部门于8日上午11点发表谈话,称:“丰台日本部队所部一部队,举行夜间演习时,第廿九军第卅七师冯治安部华兵约二个中队,由卢沟桥北方龙王庙及卢沟桥附近部落,对日军横加射击,然日军无有损伤,于是日军中止演习,与接急报而出动之丰台残留部队,距卢沟桥兵营集结。翌晨三时半,寺平大尉、樱井顾部、冀察政务委员会代行委员林耕宇等一行为现地调查计,由平赴现地,然午前五时廿六分,再受华

军射击,竟致彼我交火,至六时战斗暂告中止。目下情势,该事态不致扩大,然今后推移,全悬于华军态度如何。”<sup>①</sup>文中不好意思挑明丰台日本部队夜间演习的具体位置,倒是言之凿凿地说是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属下的二个中队从回龙庙和卢沟桥附近向日军射击,这回干脆中和前面二者所说,是从两个地方射击的,而且也交待了日军没有损伤。但这又让人纳闷了:冯治安手下的兵枪法也忒不准了,打了“数十发”子弹,一个日本兵也没伤着。但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第二天又犯糊涂了,7月9日经它检阅的一篇文章刊登在7月11日的《盛京时报》上,文中引述驻华日军××参谋的话说:“今次事件发生原因,系对日本夜间演习部队,华军竟不法射击而发,该事件发生之七日晚,日军竟出十数名死伤者……”<sup>②</sup>文中特别注明其所述内容经由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检阅,这实在是弄巧成拙了。外务省刚刚交待了日军没有伤亡,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却又说死伤十数名。看来,二者宣传口径还没有取得一致。

大概日本人也注意到了其新闻报道的自相矛盾,所以从7月10日起,对新闻报道严加管制。这一天的《盛京时报》第二版赫然印着:“关于卢沟桥事件之一切通信,即北平、天津、南京、东京各电报,均经当局许可者也,特此注明。”但即便这样,我们仍能从中看到其自相矛盾的报道。

7月10日《盛京时报》第二版,一则题为“八日午后情况彼此对峙中”的新闻,报道说:

“北平八日电”昨晚射击日军驻之龙王庙中国兵似系驻长辛店

① 《盛京时报》1937年7月9日第二版消息:“日外务当局谈 事态似不扩大 推移如何悬于华军。”

② 《盛京时报》1937年7月11日第二版消息:“努力不使扩大之 某某参谋谈话”。

之骑兵第十九师所为。日军对此不法射击,当时并未还击,仅监视其行为,及至今(八日)晨,复出以不法射击之暴举,于自卫上不得已而开始攻击,将永定河左岸之敌军击退至右岸,乃占据其中之岛<sup>①</sup>,旋于右岸登陆、目下(下午三时)彼此尚在对峙中、敌军似有由长辛店方面派来援军之势……又驻卢沟桥之卅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部队、尚在城墙内八处碉堡、毫无声息、而日军对此、亦最加监视。

这一则新闻更是漏洞百出。消息说,射击者“似系驻长辛店之骑兵第十九师所为”,“似”字倒是老实交待了日本人不能肯定射击者究系何人这一点,同时又推翻了9日关于射击者为第三十七师的报道。但这又出现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第二十九军辖有四个步兵师,分别为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和第一四三师,此外还有一个骑兵师第九师,并无第十九师。即便第十九师为第九师之笔误,该师也并不驻守长辛店,而是在南苑、固安、易县等地。同时,既然怀疑是驻长辛店的骑兵干的,为什么举兵包围宛平城?还任由“长辛店方面派来援军”?这个日本军事指挥者是不是太拙劣了?而且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既然毫无声息,为何日军还要对其“最加监视”?日军究竟意欲何为,人们不难揣度。从日

① 关于河中小岛,日方曾屡次提到。曲家源先生与日本学者秦郁彦先生互有争论,曲先生在《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第133页认为永定河中不可能有此岛,笔者曾查阅当时申报有关永定河水位的报道,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最深为一丈六尺。7月1日上午水位为一丈二尺九寸,由于雨水不断,7月3日夜急涨为一丈六尺,7月4日水势和缓,但仍为一丈五尺。即当时永定河水很大,河水稍退时或许会有小片绿洲出现,曾就教于七七事变发生之时正值北平的方汉奇先生,方先生认为,“所谓小岛,可能指的就是这类袒露出来的陆地。确切的说,有点像‘洲’。即‘芳草萋萋鹦鹉洲’那类的洲。”纪念七七事变65周年学术研讨会之际,笔者得以观看七七事变之时卢沟桥附近半景画,河中确有绿洲,日本人所称河中小岛,当属此无疑。笔者在会上提到此点,得到刘建业先生的肯定,并称曲先生业已认识到此点。

本人的相互矛盾的新闻报道中，人们也不难看出日本人关于事变的报道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的胡说。

日本人的新闻报道故意抹杀了两个事实。一、谁也没有看到射击人，而日本人的新闻报道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直指中国士兵；二、日本人最初是借口丢失一名士兵欲进宛平城搜查而中国守军不准，从而引起冲突的。这个丢失的士兵是事件的核心人物，但他20分钟后又归队了，日本人的这一借口自然失效，但其进占卢沟桥、宛平城的既定目标又不能因此而放弃，于是将矛头对准谁也不明所以的射击问题。（但在中国看来，毫无疑问，这个射击者一定是阴谋策动这场战争的日军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人。关于这一点，曲家源先生在他的《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中已有详细说明，本文无需赘言。）从事件发生到日本人开始进行相关报道，中间隔了一天，这一天的时间足以进行舆论的准备与协调。而中国的报纸大都在7月8日就进行了报道，《世界日报》于这一天的正午发行号外，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报道说：“今晨零时许，日方松井武官，用电话向冀察军政当局声称：‘昨夜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郊外演习，忽闻枪声，当即收队点验，发现缺少一兵，同时认为放枪者已入城，要求立即率队入城，搜查该兵云云。我方当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殊足引起地方不安，同时我方在卢部队，昨日竟日均未出营，该种枪声，决非我方所放，婉加拒绝。但不久，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云云。同时，我方已得报告，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前进形势。于是我方再与日方商定，双方即派人员前往调查阻止……至今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须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炮声大作，我军未予还击。俄而西门外大炮机关枪声又起，连续不绝，我军仍镇静如故。继因日军炮火猛烈，我军为正当防卫，万不得已始加抵抗。我军伤亡颇众，牺牲甚大……’”而日本人的新闻报道自

始至终未提到丢失士兵这一点。所谓“不法射击”成为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借口,由于这一个借口也是不真实的,所以日本人在谈论它的时候也是漏洞百出。

为了师出有名,在随后的新闻报道中,日本不仅强化宣传事端是由中国方面挑起的,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方面预谋的、有计划的行动。但即便这样,我们仍能从中找出一些破绽。在开始报道事件的当天,《盛京时报》就急切地下结论,断言:“此次事件企图搅乱冀察”,“闻今次事件之黑幕、或系企图搅乱冀察南方之魔手所及欤。”<sup>①</sup>日本人或许以为这种说法可以为以后的宣传埋下伏笔,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殊不知这一“闻”一“或”,两字又不巧地透露出这纯属日本人的无稽之谈。但日后,日本人却把这个无稽之谈演绎得煞有其事,似乎不“膺惩”中国,就天理难容了。7月9日,两个受伤的日兵中村、伊藤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据余所见,此次华侧行为,殆为计划的。”第二天,一个叫川村准二郎的中尉7月10日上午接受记者访问,说“今次战斗地带,余等因屡次演习,故地理上尚不生疏,但仅敌军本阵已超过余军以上,其明了正确,实可惊人,虽敌人却值吾人钦佩也”。<sup>②</sup>日本兵虽统一了口径,但究竟中国方面如何策划,却也说不出个所以,倒是川村中尉的话让人看出这实在是日本人的阴谋。首先,他交待事变发生前,日兵在卢沟桥一带屡次演习;第二,日兵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已对这一带的地理形势非常了解;第三,事变发生前,他们非常清楚卢沟桥驻守部队的情况,本以为只凭着这一支演习部队就可以将卢沟桥拿下,没成想“敌军本阵已超过余军以上”,而且中国人顽强抵抗,以至日军迟迟不能拿下目标。

① 《盛京时报》1937年7月9日第二版消息:“此次事件企图搅乱冀察。”

② 《盛京时报》1937年7月11日第二版消息:“卢沟桥事件余闻 日军将兵等谈称。”

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自己完全能够利用他们的新闻宣传回答这一个问题。且让我们先看一下当初日本人的报纸是如何分析中国士兵的所谓“不法射击”的原因吧，从这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出些端倪。

7月10日《盛京时报》第二版共刊登了30多条消息，对事件起因多有论及。其中题为“华军不法行为原因基于三中全会 日陆军重视此后动向”最有代表性。其文如下：

“东京九日电”日本陆军当局以为华方今次之不法行为，纯系基于日前三中全会之结果，其根底极为深刻，因之，华方今后动向殊堪重视。原来中国方面于三中全会中倡议收回冀东察北，为对日根本政策，于是巨冀东察北六县开始大规模排日运动，乘冀察政权微温之取缔，频发抗日反满色彩浓厚之不法事件，最近就不法事件观察，达五十件以上。陆军当局关于事态之重大变化，亦加以深甚之关心……此外，不法暴行行为，连日有反复之实情。今次事件，亦中国方面之计划行为，征诸前后经纬，甚属明了，闻日本当局意向，对于华方斯种自暴自弃之行为，似逐次硬化……

日本人不打自招，原来是中国统一的步伐触痛了日本的神经。“何梅协定”之后，日本人开始不遗余力地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而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倡导华北中央化，使日本人苦心经营了若干年的华北自治行将流产。日本人号称自己在华北有着特殊的经济利益，他岂能坐视利益受损而无动于衷？及至事件发生，又“征诸前后经纬”推论说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动。而口口声声不扩大事态的日本当局居然要根据这种无根据的推论实行对华强硬态度，日本人究竟想要干什么，通过分析这些新闻报道人们不难得出结论。

其实，早在8日上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下达命令：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缺步兵二个小队）、战车一中队、炮兵第二大



队、工兵一个小队中午由天津出发去通州公路到达通州，由步兵旅团长指挥。<sup>①</sup>但下午三点该部却对新闻界撒谎说：“日军除促反省为本案发端……令在通州大操中之北平部队返回外，仅由天津派来卫生机关等耳，如华不改其非，出以扩大战线之愚举时，则日军必不得已出以毅然措置。”<sup>②</sup>同时，日本的军事布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海军中央部也就在这一天即7月8日命令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防地、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陆军中央部则于同日夜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等于增加了四万兵力。倒是我们可以“征诸前后经纬”推论出七七事变完全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阴谋。

从开始报道事变的第一天起，日本人的新闻报道就附和着军部的论调，咬定事变是由中国方面策划的。10日，《盛京时报》一则消息报道：“关于卢沟桥事件，日高参赞、大城户武官等驻宁官宪八日正午在大使馆协议结果，意见一致如左即此次事件，国民政府为达成华北中央化起见，最近对第廿九军之中坚将校盛行鼓吹抗日救国精神，并蓝衣社及CC团对民众实施秘密抗日工作所助成者……”<sup>③</sup>不但日本各级官僚在事变起因上迅速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且日本各大报纸在舆论上也极其迅速地形成了统一的见解，异乎寻常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些报纸在开始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当天，就对事变起因迫不急待地做了“深刻”剖析，叫嚣要“鹰惩”中国。《盛京时报》7月10日转载了四篇日本报纸的社论，其中尤以这三篇有代表性：

① 参见《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中共中央党校史教研究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第22页。

② 《盛京时报》7月10日第二版消息：“日华两军战斗情况。”

③ 《盛京时报》7月10日第二版消息：“日驻宁现地官宪协议卢沟桥事件。”

### (一)《中外商业新报》社论:

事非简单,两军既已交战,当此际宜避姑息的解决,须由根本上谋解决。中国军对于日本军队之要求反省,完全不肯承认,且更得炮兵部队之增援,对我部队频持挑战行为。由此观察,今次事件,决非偶发的事件,且在龙王庙附近构筑炮垒,配置守备兵,此足证既定之计划的挑战行为、故事态决不能轻视也。

国民政府之华北中央化工作,亘所有一切部门深刻讲究,今次事件,如更进一步推察,则可知此种华北中央化工作暴露之一端。

即行使武力、企图打倒日本在华北之特殊地位,如中国军正当认清日本之在华北特殊地位,则必不敢如此无谋之暴举,故如欲积极的维持特殊地位,则须废除此种抗日政策。又日本如以现状维持之消极方针,则以自重态度,促华方自觉时,华方必蔑视日方无力,缺乏时局认识,其结果不顾其身之实力脆弱,欲将对日加以压迫。故此次事件,实不可目睹,无论华方愿或不愿,须加痛棒惩戒方可。

### (二)《读卖新闻》社论:

华北中央化基于三中全会之决定,南京政府以国内统一强化及完成行政权为目标,积极进行。因此,冀察大势,亦渐次为中央高压态度所抑压,倾向排日。忧虑其今后成行者,不独我官民已也,最近视察华北其记者,曾发表高见,谓现地事态,仿佛有满洲事变勃发以前之空气。吾人准是以观,华北情势如何频呈恶化,可以知矣。我驻屯华北军队对此情势,因前年去年连续发起丰台事件之前例俱在,故极力避免发生事端。庸詎知华方目此,藐视日军无积极之意,渐对我军投下轻侮眼光,最近华方骄满态度尤为显著。故如今次不法射击事件,与其谓为偶发者,毋庸谓其里面实藏有我军威信之意示,此不可忽视者也。南京政府即使国民主张趋向抗日,强化绥远蒙古战线,而复乘势极力进行以改组冀察政权及解消

冀东政府为目的之华北中央化。若夫派遣税警团之赴鲁也，使冯玉祥等之北上也，是一面怀柔，一面处罚，已具体现示于吾人之前。今次事件原因即在于斯，卢沟桥事件，局地虽可解决，奈过恨太深何？倘南京政府终不根本悔改其态度，则日华关系，以此机会，趋于如何恶化，殊使我人不禁忧虑不置。

### (三)《东京日日新闻》社论：

驻平日军在该地附近举行夜间演习，决非初次之事，然从前并未发生故障，此次华军队不可解之射击，基于故意或误解，尚未明了。若出于故意，则华北问题或有招来全面的、复杂化之危险性。由最近形势而论，事件直接原因或有招来全面的、复杂化之危险性。由最近形势而论，事件直接原因为恶意或误解，至发生事件之根本原因，俨然另有存在，即在第二十九军全体所弥漫之尖锐的抗日意识是也。于其背后，中央以强烈的势力把握华北军队，政治家、青年学生，而拟以国民党意识感化之事实，此事为其根本原因。事件虽不大，然考及发生事件之根本，则成为深刻的问题，可谓蒋介石氏企图之华北中央化之浪头上之磷光一般。从而蒋介石今后不停止华北中央化之强行政策，则如斯事件之续发，必有可能性。可以想见，于是从来为满日华间之缓冲的理想地带之特殊政权而树立冀察政权，将必丧失该政权面目及机能……宋哲元之逃避问题，亦为一种消极的抗日。兹对如此事项下其判断，于此次事件背后，有华北政权自身，并有南京政府，尚未可知。吾等希望此次事件，终于现地军队之一部冲突而不扩大者，据吾等所观，事件之扩大不扩大，全悬在华侧态度如何，故希望国府勿宜徒然赶紧将华北中央化，须直视事态，而采用现实之态度云云。

这3篇社论与日本陆军当局的所谓判断相呼应，都将事变起因归咎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华北中央化”政策。一方面，中日双方代表正在现场调查原因；而另一方面，日本媒体早已急不可待地

下了一致结论。这简直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与其说是剖析中国方面的原因,无宁说是暴露了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最初的目的,即逼迫蒋介石停止华北中央化的政策,同时使逃避问题的宋哲元由老家乐陵返回北平,使其答应日本所提出的要求,以结束日本在华北交涉无对象的局面,确保并促使华北自治早日实现。

虽然我们无法看到日本人如何布署新闻报道的原始文件,但综合其在日、满的新闻宣传,我们不难看出各报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宣传口径,即:事件由中国方面引起,而其原因则是华北中央化;“倘南京政府、终不根本悔改其态度”,则事件必然扩大;事态是否扩大,全在中国态度如何。《中外商业新报》甚至喊出了“无论华方愿或不愿,须加痛棒惩戒方可”这样赤裸裸的侵略论调。《读卖新闻》则鼓噪着全面侵华,“卢沟桥事件,局地虽可解决,奈过恨太深何?”一句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卢沟桥事变是不可能局地解决的。其恨何来?乃华北中央化也。从这些新闻宣传和日本在事变前后的军事布署来看,日本政府一再声称不扩大事态完全是欺世谎言。

在7月12日的《盛京时报》号外日本驻北平陆军武官室发表的“卢沟桥事件全貌”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看到日军是如何粉饰自己的。文中说:

此次事件,全为积年假装之南京政府反日工作所致。特自六月以来,随由南京政府系抗日份子潜入平津地方,暗中活跃以致在城内外流言蜚语盛行人心益形不安,廿九军兵士乃受影响,暗中恐惧,遂于七月七日晚,对于在卢沟桥北龙王庙附近、正在演习之丰台日部队,由廿九军骑兵团,射击数十发。日军演习并非以此为初次,从来受有承认,如诽议此行动,无异华方恶宣传,日军虽受不法射击,于不论明时,并未应战,而切望将事和平解决,以免灾祸殃及良民,竭力努力以求开始交涉,暴戾而未讲理之华军对于以正义为

立脚地之日军态度,竟回答以射击矣。日本军对华军如此暴虐不得已,由自卫立场竟而应战,一方希望和平当即向现地派遣日华调停委员,努力阻止事件扩大,然彼等闭锁城门,阻止由卢沟桥入城,又加以不法射击。

如果说以前的报道还替日军的侵华暴行遮遮掩掩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简直可以说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了。文中说日军演习,“从来受有承认”,是谁?何时?日本人咬定说是根据《辛丑条约》,但该条约规定的12个外国驻兵地点为: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并无丰台,更无卢沟桥。丰台于1936年秋即被日军强占,本来就已经属于非法了,却还要跑到卢沟桥附近中国军的警械区内演习!日本驻北平武官室倒是承认演习“非以此次为初次”,但却理直气壮,并要求人们不得非议,否则便是中国方面的恶意宣传。这里面,日本宣传又故意隐瞒、歪曲了几点事实:一、日军绝非“虽受不法射击”“并未应战”,而是“于不论明时”举兵包围了宛平城,所谓“以正义为立脚地之日军态度”,就是要求中国守军撤退,而由日本军队进驻,也就是占领宛平城。二、中国守军“闭锁城门”,绝非是阻止调停人员入城,而是防止日军进城,而且事实上中日调停人员也都进入了城里。三、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绝非日军,而是被日军包围的宛平城内的中国军民。要论自卫,得是中国方面;要论不得已而应战,也得是中国方面。日本人为了师出有名,在其作战指导方针中指示部队“以执行自卫权的名义进行作战”<sup>①</sup>,其新闻宣传也处处以自卫的名义为其侵略行径辩护。四、在第一条里,分析事件起因时归咎于“积年假装之南京政府反日工作所致”,从其口吻看,似是精细

① 日本海军军令部制定的关于对华作战用兵秘密指示,《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42页。

调查的结果,实则不然,完全是日本人的胡诌。廿九军兵士即便受了影响,又怎会“暗中恐惧”?又怎会在恐惧之中开枪呢?这个理由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关于宋哲元是否回归平津,日本人的新闻报道十分关注。《盛京时报》在开始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当天,就以“宋对冀察电令善处”为题,进行报道,说:“冀察政务委员会向山东省乐陵之宋哲元去电报告卢沟桥事件、电请宋哲元返任、然宋哲元电训不使事件扩大并善处方法,返任与否,未曾言及。”第二天,该报第二版以“冀察政权往何去 决其命运之一宵”为题,说“综合诺般之情势观之,此次战斗,正立于斗争与和平之重大歧路,迄至天明之数小时,乃冀察政权决定随同日本欵或告决裂欵命运之前夜也。”这则消息似乎透露出日本人在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曾下过一个赌注,即冀察政权或因此而随日本心愿宣告自治,与日本共存共荣、相互提携;或与日本彻底决裂。但日本人综合分析了宋哲元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宋哲元的近期表现后,似乎料定了宋不会贸然与日本决裂。只要宋及时返任,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似乎就唾手可得了。13日该报又以“事态不许乐观 桥本驻津军参谋长谈”为题,报道来自天津的11日电讯,说:“因宋哲元滞留乐陵,故有不能统制之虑,驻津日军,极力劝诱宋哲元迅速归津,无奈南京政府侧,向宋氏加以策动,不知何时归津。华既承认三条要求,故不致扩大事态与否,遽难断言。”这则新闻透露出日本人希望宋哲元返回平津的迫切心情。“驻津日军,极力劝诱宋哲元迅速归津”,如何劝诱,文中没有交待。但“极力”两字,却透露出日军在使宋哲元归津问题上大费了一番周章。其实,早在7月3日,《申报》就报道了该报记者二日从天津发来的专电,云:“宋哲元因庶政待理,拟下周回平主持,北宁已为备

专车,拖沧州备用。”<sup>①</sup> 11日,宋哲元返抵天津,日本人按捺不住高兴,于13日报道:“曾赴故里乐陵扫墓中之宋哲元十一日午后抵天津,预定十二日返平。此次因冀察政权,无有责任者致不能解决,招来迁延解决,兹因宋哲元之归任,冀察得人,关于日华折冲,必可期待迅速的决断。”<sup>②</sup> 19日,宋哲元由津返平,《盛京时报》又不失时机地报道说:“宋氏归平,对官民给予事变圆满解决之希望。”<sup>③</sup> 同时,日本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并在新闻报道上毫不掩饰地挑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欲使华北自治之心昭然若揭。1937年7月11日《盛京时报》第二版头条消息,黑体大字标题:“卢沟桥案善后交涉 日华在平开始 谈判日期? 形式等未定。”内有两则电文:

“天津十日电”……日侧所希望者,如幕僚谈一般,使华北成为日华两国可能提携之事,为达成该目的,不惜尽最善努力,只期待华北明朗化。最近华北,因中央压迫与赤色人民战线之魔手,不祥事件,接踵频起。冀察政权成立之本来意义渐次消灭,借口统一之美名,盛行苛敛诛求,旧东北之整军情形,可怜可哀。此次事变,国府使第廿九军挑战日军,使冀察要人陷于牺牲,中央侧可不劳而收冀察于掌握中,国府如此态度,愈可明了认识。故冀察当局,此次断然排斥国府不法的压迫,芟除被赤寇跳跃之反动分子,非努力根绝日华侧惹起不祥事件不可。由此观之、冀察政权似立于如此根本方针以处理事态。

“北平十日电”卢沟桥事件善后措置交涉,从今次事件具有最深认识之日本军与冀察当局间现地举行,此为从速而且简单能获

① 《申报》1937年7月3日第三版消息:“宋哲元下周返平”。

② 《盛京时报》7月13日第二版消息:“宋招廿九军干部 协议卢案对策”。

③ 《盛京时报》7月20日第一版:“宋哲元由津返平 官民希望圆满解决”。

美满解决之捷径。故将今次事件,如作为中央之交涉问题则必难望从速而且圆满之解决,且再恶化时,始告一结束之今次事件,再诱导于纷纠扩大,亦未可知,日军及冀察当局,鉴于此情,为期就地解决,自昨晚起,似已着手交涉准备……

这一天的新闻报道侧重于挑拨离间,日本人似嫌这两则电讯力度不够,又加一条相关新闻“国府阴险之态度 电命冀察继战”,云:

“北平九日电]当此次卢沟桥案,已判明南京政府除对冀察当局发出煽动的电令,应继续强硬的战斗外,并电命驻山西省南部之中央军准备出动。盖南京政府对此次事件,以为奇货可居,煽动冀察,使事件极度扩大,藉日本军之力,击败廿九军,趁机借口救援、派来中央军换防,总之不外拟具现冀察中央化阴险已极之一举两得划策也。而战斗低迷之事件,竟得急转直下而告解决者似因冀察及日本当局看破南京政府之奸策,下以勿为其所愚之决心结果所致也。

读了这几则电讯,人们应该不难明白卢沟桥事变的真正起因了。从《盛京时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理出这样的脉络:枪声——占领宛平城——逼宋返平津——华北自治、脱离国民政府。谎言毕竟是谎言,很难自圆其说。尽管日本一再声称事变起因在中方,不厌其烦地使用“不法”、“暴戾”等字眼,以使其“膺惩”、“教训”得有理。但言多必失,日本军部虽统一了论调,却奈何不得人们七嘴八舌,把前后经纬说得相互矛盾。而且,其发动事变的真实意图也很难隐藏,往往在一条新闻中、一则社论中、一个发言人的讲话中就露了馅。



## 二

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是完全有预谋的,并且是精心策划了的。事变前,日本军部派员在中国东北、华北频繁考察。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香月清司中将曾花一个半月的时间对日本在伪满和华北的军队进行视察,6月5日就华北状况作出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sup>①</sup>事变发生后,7月11日,这个熟知华北情形的香月清司即被任命为日本天津军司令官。月底,参谋本部井本熊男大尉就其视察所见报告说:“日本方面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存在分歧……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日本侨民身受中国挑衅,因而激起了对华的敌愆心。这种状态还不明白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sup>②</sup>石原莞尔则对日军内部流传的“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的说法“颇为忧虑;并认为对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必须留意”。<sup>③</sup>从5月份开始,日本驻丰台部队加紧了军事训练。进入6月,其以攻占卢沟桥为目标的演习更加频繁。6月16日,日向东北增兵两万;21日,日华北驻屯军成立临时作战课;25日起,该驻屯军开始在北平近郊进行连续两个星期的演习;同日,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到丰台阅军。演习中,不仅要求“每一官兵都要熟记驻屯地附近地形,并熟练夜间行动。同时,对于中国军首脑的住宅和兵营、城门等处,也都策划制定了奇

①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有关中国、特别是华北形势的资料介绍》,《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同上。

袭计划,并使所有干部分别到实地多次对各目标一一勘察,以及多次实施演习、检讨,以决定出动时之编组,俾到目的,期无遗憾。”<sup>①</sup>事变发生后,7月8日凌晨3时,天津日军主任参谋大本良枝根据事变计划起草了一份《宣传计划》,说:“为了‘主动诱导事态的推移,争取最有利于我国的立场’,绑架、监禁秦德纯、冯治安,让退居山东故里的宋哲元复归平津,至迟在7月9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县城……”<sup>②</sup>从这一点看,北平城自6月26日起开始实行夜间特别戒严是完全必要的,它有力地阻止了日方企图绑架冀察要人的阴谋的实施。事变发生后,北平城门即行关闭,也是完全合理的防卫措施。正是由于妨碍了日军的既定计划,日本人急切、无理地要求冀察当局即行撤销北平市的戒严,并就此一问题在新闻报道上大费周章。

《盛京时报》7月10日报道:“北平城东门朝阳门,自今晨以来即行紧闭,以致由通州方面而来之日军,不得入北平,只得徘徊于城外。日方曾经要求开门,而北平市长秦德纯即答以如无冀察政府许可,碍难应命等语竟出以阻止日军通行之态度。”<sup>③</sup>这未免有点大惊小怪了。战事既起,阻止敌军入城乃属军事常识。并且结合上述日军的奇袭计划,这股要求入城的日军八成就是来执行绑架冀察要人的任务来的。同时,《盛京时报》另一则相关报道却不能不让人警醒,消息说:“戒严令下之北平,至夜一切交通杜绝剧场电影院均休业空气愁惨,沉默静寂日居留民会,召集义勇军,关于万一时之手段,节节协议。”<sup>④</sup>这是8日的电讯,何以事变刚刚

① 转引自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② 永井和:《关于卢沟桥事件的一史料》,转引自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第171—172页。

③ 《盛京时报》7月10日第二版,“平朝阳门紧闭阻止日军通行”。

④ 《盛京时报》7月10日第二版,“旅平日侨准备万一”。

发生,居住在北平的日侨就迅速地召集了“义勇军”?这支“义勇军”与发动事变的日军究竟有何关联?今井武夫的一句话或许能使人们茅塞顿开。他说:“实行特别戒严理由不详。传说不一,有的说是由于驻扎北平附近日军频繁演习,国民政府指示应加以注意;有的说收到情报,受日本人唆使的一些中国人要占领北平,或者说北平市内要起暴动等等。”<sup>①</sup>综合这几方面的情报,我们完全有理由进行这样的推测:配合卢沟桥事变的同时,日方本欲同时在北平有所行动,这就是:绑架冀察要人、“义勇军”暴动,并进而占领北平城。只是由于朝阳门紧闭使由通州而来之日军不能进入北平同时北平城内戒严而未能实行。北平当时的治安何其混乱,由此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戒严,乃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而这却成了华方迫害日侨的一大罪状。《盛京时报》7月13日报道:“现今华军包围北平城外,并对主要日侨家屋、华兵加以监视,日侨交通,异常受胁威。”<sup>②</sup>北平城的戒严打乱了日本人的既定布署,激恼了日本人。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除由官方交涉要求撤销北平市内戒严令外还策动北平城内的汉奸组织请愿,要求廿九军撤出北平城,企图兵不血刃占领北平。7月15日,《盛京时报》第二版以醒目标题“北平商务总会请愿廿九军撤退!!”报道:“北平商务总会十三日午后向宋哲元请求,第廿九军由北平撤退,盖廿九军及其他军警,于主战的空气中狂奔,然一般人民间,充溢爱好和平之精神,以为不忍将四十年来之和平乡北平城卷入流血惨事,现考究对策中。”同日,该报还报道:“刻下北平市内,于戒严名义下,对于日侨迭有几多逼害之不法行为,而廿九军兵士,大有傍若无人之

①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有关中国、特别是华北形势的资料介绍》,《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15页。

② 《盛京时报》7月13日第二版消息:“华军包围北平城日侨异常受胁威。”

势,为日侨生命财产安全,认为华方绝对必要早日停止此举,日侨对此种压迫,有坚固对处万一场合之悲壮决意,妇孺等亦陆续准备不得已避难事项,缘廿九军之在此,对于北平市民殊予多大威胁,外籍戒严美名,内实为搅乱北平治安之重大要素,故要求其撤出城外之呼声渐高,顷北平列国侨民,以中国公民之名,对北平市长秦德纯,要请善处之方云。”<sup>①</sup>日本人可谓是机关算尽了,但负有保家卫国之责的廿九军如何威胁北平市民了?为何戒严反倒成为搅乱治安的重大因素?日本人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倒是日侨义勇军的报道、通州日军欲进北平城而不得入的消息为我们诠释了日本人要求撤销北平戒严的动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在叫嚣撤销北平戒严令的同时却宣布在伪满地区实行警戒管制。《盛京时报》7月14日第四版有两条消息:“南地区颁布防空令奉天地区入于警戒管制”,“南满防卫地区各地一律下令防空”。15日该报十一版消息:“安东防护团发表入于警戒管制。”报道各该地均于13日进入警戒管制。按照日本人的逻辑,这种警戒管制应该是搅乱治安、威胁市民的,为何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却不顾这样的“道义”亟亟而行戒严之实?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强盗是不讲道理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理”。

关于北平城戒严的报道是《盛京时报》这一时期的重点。从10日开始,几乎天天都有相关报道。到24日共发表了25篇此类消息和照片。10日第二版就有五条相关消息,分别为:“冀察在北平颁布戒严令”、“任命戒严司令”、“旅平日侨准备万一”、“平朝阳门紧闭阻止日军通行”、“交通一切断绝”。使人讶异的是日本人竟然把北平戒严宣传成“华侧计划的挑战”行为之一。7月11日凌晨二时,日陆军首脑部在陆相官邸紧急协议对策,认为“对此次华

<sup>①</sup> 《盛京时报》7月15日第二版消息:“华巡警藉口戒严 不法压迫旅平日人”。

侧计划的挑战以如左事实,全为明白,若招来重大结果,其责任全在华侧”。<sup>①</sup>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北平城壁并要冲构筑砂囊阵地,严重警戒者”。为了增加说服力,《盛京时报》还在15日的号外上刊登了两张照片,照片说明分别是“在北平城内构筑土囊之廿九军”、“北平各城门由暴戾之廿九军闭锁,城内外交通完全杜绝”。及至冀察当局答应开通北宁铁路,不再由廿九军担任戒严任务而改由公安巡警执行时,日本人仍不罢休,在报纸上说:“观察十四日夜之戒严施行状态,命令略为彻底,廿九军兵数亦减少。然如此状态,决非满足。”并进一步解释说:“超越北平城内程度之戒严,对于一般人民,殊予极不舒快之感,均希望迅速撤废。冀察当局,有鉴于此种情势,决定实施戒严期间,为下午十一时以后,讯问盘诘,专由巡警为之。又据冀察当局言,预定近日以内,解除戒严。”<sup>②</sup>其新闻宣传一再声称撤销戒严是为“一般人民”着想。殊不知,一旦铁路开通,日兵便大举开入了平津地区;而北平城内撤销廿九军构筑的土囊阵地后不久,日本人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平。18日晚,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贾德耀往访今井武官,通告华方已下令撤防北平市内要路所配备第廿九军士兵。19日晨,宋哲元乘上了由津返平的火车。当车行至杨村西侧桥时,发现地雷,经调查原是日军所为,幸而受日军指使的中国人在布雷时拆去了引信,使列车安然无恙。而日本人却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说:“在北宁线杨村与北仓中间之廿九号桥梁,于今晨七时,由一路警发现爆药装置,平津间列车得免发生危险,此似由其共产系学生团,为遮断日

① 《盛京时报》7月12日第四版消息:“日陆军中央部 夤夜协议对策”。

② 《盛京时报》7月16日第一版消息:“华方实施日要求 然未到满足状态”。

军后方连络,出此行动。”<sup>①</sup>此时,日军基本上已完成了军事布署,宋哲元已可有可无,此时除去他,日本人还可以栽赃给共产党,从中大做文章,不但可以坐收渔利,还可以乘此大举出兵,扫平华北。但宋哲元对地雷事件并没有引起警觉,仍抱着和平幻想。返回北平后,他当日即下令拆除了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沙包和路障,并将关闭多日的城门完全打开,即便是日本武装兵也可以自由通过。对此,日本人表示高兴,称“百五十万市民自事变勃发以来经过二星期后,始横溢安心空气……警备市内之廿九军,已减半数,市内虽仍维持戒严令,但稍呈活况云”。<sup>②</sup>宋哲元的软弱丝毫不能改变日军既定的侵略计划,反倒使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实施。同日下午5时许,日军又开始攻击卢沟桥,故意挑起战端,却宣传说是华军“又对日军加以不法射击”<sup>③</sup>,而“日军在此间,隐忍自重,并未还击一粒子弹,忠实履行协定”。<sup>④</sup>晚10时,华北日军司令部宣布20日正午以后将采取独自行动。20日下午2时,日军对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开始了所谓的“鹰惩”攻击,而“其责任全在忽视协定之第廿九军”。<sup>⑤</sup>这样,日本人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卫”战。

为了给“自卫”找足理由,日本人的报纸在此期间经常刊载中国方面的所谓“不法”与“暴虐”的事件。但是,这些所谓的华方“不法”与“暴虐”,实在是日本在华的不法与暴虐。7月15日,日军陆

① 《盛京时报》7月20日号外第一版消息:“在北宁路桥梁装置炸药 或系共产党员所为欤”。

② 《盛京时报》7月20日号外第一版消息:“宋容纳一部要求北平城内呈活况”。

③ 《盛京时报》7月20日号外第一版消息:“华又加不法射击事态愈趋严重”。

④ 《盛京时报》7月20日号外第一版消息:“廿日正午以后 或采独自行动 驻津日军司令部发表”。

⑤ 《盛京时报》7月21日第一版消息:“日军最前线炮兵队 向华军开始攻击矣”。

相杉山在紧急地方长官会议上发表训辞,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与今次事件有关之丰台,乃系去年秋天中国军侮辱日军事件发生之地也。”<sup>①</sup>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国土,反倒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杉山陆相不但自己这样说,还要求国内舆论统一,以“发挥举国一致之实绩”,并且说“此为最紧要之事务也”。<sup>②</sup>《盛京时报》遵照执行,在披露华方“暴行”时,丝毫不吝惜篇幅。

7月17日《盛京时报》号外报头下方有醒目的一个方框,内写有:“本纸第二面有重要记事请读者注意是荷”,翻到第二版,一条醒目的大标题“此次华北事件原因 华侧不法行为如此”便呈现在眼前。笔者饶有兴味地读将下去,试图找到足以引起事件原因的一些华方的“不法”行为,但是未果,反倒是日本侵华的嘴脸不折不扣地显现了出来。为使读者诸君明了,全文录入于此:

此次华北事变根本原因,即南京政府之抗日侮日行为,否认日本在条约上之既得权益等等。华方不法不信行为,实不胜一一枚举,现录最近两个月间所发生之显著事件,竟达惊人之数,兹故一一披沥于左。四月六日,绥远省主席兼绥远剿匪总指挥傅作义入平,尔后十八日为止,逗留北平,其间与军、政、学各界互取联络,盛行自己宣传、力主拥护南京政权,同月十一日,天津学联通电全国力主左列三项:(一)撤废领事裁判、(二)不买私货、(三)设立武装缉私。天津律师会关于撤废领事裁判权促进案,亦拍发通电。前为冀察南京化策动来平之居正,南下途上,亲抵青岛与新闻记者会谈,声明“中国八月

① 《盛京时报》7月16日号外第一版:“日紧急地方长官会议 外·陆·海各相各致训辞”。

② 同上。

一曰宣明撤废治外法权,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之旨。为抗日救国歌作者最有名之巢良模,由上海经大同、太原、汾阳、保定等来平,似对一般民众、军队方面主唱抗日。冀察要人等商洽结果,旧抗日东北义勇军、废残兵六十五家族三百五十名,决收容于德胜门救济院,以备他日。同月廿一日,南京政府之华北工作案,今日始得知如次。文化工作...华北之各大学校长由南京系人物更迭之,南京大学决以孔祥熙为校长,对于他私立大学,亦开始工作;经济工作.....严重取缔私运,并征收所得税,俾使民众养成信赖国府之感情;交通工作:A何竞武为华北运输司令,平汉、津浦、北宁、陇海、平包各路长为副司令之军部组织化;B对各路从业员,决授与军事训练,自五月一日起,每三个月在南苑施行.....

五月七日在张家口,日本人虽以理由被绑去,在华兵营大受殴打。八日,在张家口对军用汽车有华人投石者,因此车窗、车体破损甚重。同日,宋哲元由天津寓居前往故(乡)山(东)乐陵,为扫墓告假二十日。其实为脱离津石铁道敷设问题空气之一种逃避行为。十二日,北平日本小学校儿童通学途上受华人暴行。(十二日起至十五日每日均有此种事件)十八日,南京政府使五十三军成南京化,近召该军参谋长赵国余赴南京。同日,陈觉生为监察院华北监察吏周利生以密输品运送、盗卖铁路名义而告发。东北大学生三百四十七名要求解放张学良,南京政府向学校发与补助金复活赴宁(原文如此)、冀察许无费乘车,但车抵江苏省柳泉时.....教育部给旅费一千元使之北返,学生于廿五日归北平。二十日,相传中央使第二十九军移驻河南,刘峙军北上,乃疑宋哲元,以企图华北压迫之积极化。廿一日,宋哲元发出布告,出卖土地于外国人者,不问官民,一律处死刑。东北大学父兄等组织学生后援



会赴宁,因冀察当局不许可无赁乘车中止。廿四日内政部长蒋作宾来平,虽谓为泊洲起义烈士葬礼及参诣总理衣冠冢,但为南京化策动事实显著。廿九日,冯玉祥入济南,会见韩复榘。卅日,蒋作宾巡视华北绥远,各地为中央化完成,努力鼓舞激励。六月四日,以取缔华北密输为理由,天津海关长对财政部电请向天津附近派遣税警团。六日,青岛市长沈鸿烈出如左之布告:一无地方办事处及市政府之许可,不得向外人让渡土地:二、外国品(指日本品)禁止使用。九日,青岛北方七〇公里,即墨县汤上村新设近将开业之日华共同出资的汤上温泉,中国侧代表张百川氏,为青岛市政府召唤威吓之曰,拒绝日本出资,否则一切封产,予以没收。廿一日,大连赴冀东之东平号,为中国税关监视船捕获,糖、杂货酱油及其他约七万圆货物,均被没收。七月八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固锁市东侧城门朝阳门,对日本部队之通行,不法阻止。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不胜一一枚举”的“华方不法不信行为”!宋哲元扫墓告假、秦德纯固锁朝阳门、国人不得贩卖土地与外国人的命令、税警团缉私、傅作义逗留北平、冯玉祥会见韩复榘、甚至连作曲家到北平都成了华方“罪不可赦”的罪行。桩桩件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到了日本人的眼里都成了滔天大罪,成为日本必须“鹰惩”中国的理由。经过这样一番精心铺垫,《盛京时报》主笔菊池贞二以“傲霜庵”的中国笔名发表社论《吾岂好战哉》,说:“兵凶战危,不得不虑,然国际间有沉闷阴霾之空气,弥漫无休,则不若直截了当,痛快快快诉诸干戈。决一死战之为愈,人类终不能在阴惨的浓雾中生活度日,所以有时欢迎暴风雷雨,近一两年来,吾不惮一再主张中日开战论,亦以此故耳,以战弭战,虽战可也,吾岂好战哉……故如卢沟桥之小冲突,本是星星之火,不足轻重,试由过去

七年间慢性非正式战争过程观之,今日之酝酿大事,并不是偶然,势所必至者也。昨今日本方面亦注意及此,乘此机会,欲出以直截了当一了百了之计,为自然的归宿,无复如何者耳,至少孤掌难鸣之吾中日开战论,可谓至是始获共鸣矣。”并堂而皇之地呼吁:“以中国大国手自命者,于慷慨忧国之余,须注意于文化史上异民族输血作用之万难间却而已。”<sup>①</sup>就是说中国人应当吸取历史经验,感谢异民族的侵略。

菊池贞二一贯主张日本加大、加快侵华的步伐,他所主办的报纸配合着日军侵华的军事行动,力所能及地进行了舆论上的准备和动员。卢沟桥的枪声,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高度兴奋起来,他们认为可以借此机会“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以求华北安定”<sup>②</sup>,也就是菊池贞二拍手叫好的“出以直截了当一了百了之计”。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本的新闻宣传家们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自觉地站到了一起,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护。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新闻事业就成为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舆论工具。其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传播功能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35年9月,日本军部在一份文件中强调:“军部必须有计划地有效地利用报刊新闻的宣传鼓动机能。”<sup>③</sup>1936年8月7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为保证实现其根本国策,应“指导

① 《盛京时报》7月18日第一版社论:“吾岂好战哉”。

② 《日军参谋本部第三课作成的〈处理华北时局要领〉的方案》,《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22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0页。

和统一国内的舆论,使其在突破非常时局方面,巩固国民的决心”。<sup>①</sup>七七事变后,日本舆论迅速达成一致,这不能不归功于军部对舆论的指导和利用。7月21日上午,日本新闻协会举行理事会,形成决议:“我日本新闻协会基于东亚时局不安定,并国际公道之基准,支持帝国政府之措置,后援陆海军将兵,并将全国人心,振兴而且说统一。”<sup>②</sup>这个决议形成后,“立即通达近卫首相、杉山陆相、及米内海相”<sup>③</sup>,以便使这些战争的策划者放心,新闻舆论界在支持战争方面是不成问题的。朝日新闻社甚至举办了献纳军用机运动,据报道:“献金者接踵而来,廿日,东京朝日达十万四千九百四十六圆三十九钱,大阪朝日达十三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圆八钱、共计廿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圆四十七钱,此等献金款额,为未曾见之划期的记录。”<sup>④</sup>各个报纸言论一致,迅速煽动起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情绪。《盛京时报》由于是在中国东北,要面向广大的中国读者,在宣传技巧上更加注意,常常借中国人之口进行宣传,就连菊池贞二也要煞费苦心地取一个中国人的笔名。配合着报纸宣传,各地还时常举行华北事变讲演会、时局恳谈会,力图加大、加深军国主义欺骗宣传的影响力度。《盛京时报》七七事变后不久几乎天天有各地献金消息、各部门写给日军的感谢信、汉奸拥护日军的声明。如7月19日第二版刊登题为“旧东北要人联名爆弹声明日军拯救华北民众 誓必始终诚意拥护”的消息,说“倘至最后万不得已之场合,则大日本帝国忠勇道义之皇军,发挥其扶持正义人道之精神,拯救华北民众于苛敛诛求虐政之下,当操必胜之权,毫无

① 《国策的原则》,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印:《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2页。

② 《盛京时报》7月22日号外第一版消息:“日本新闻协会决议支持政府”。

③ 同上。

④ 《盛京时报》7月22日第一版消息:“朝日新闻社举办献纳军用机运动”。

疑虑”。日本人的侵略行为被宣传成为“拯救华北民众于苛敛诛求虐政之下”的义举。各感谢电文无一不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之作，内容全是恳请日军彻底膺惩中国之词。如落款为“奉天联合町会会长藤卷快教”的感谢文，说：“奉天联合町会全会一致，对此次之华北事变，于三伏之炎热下，与暴戾中国军对峙中，贵军将兵各位之御奋励、御劳苦，表以深甚感谢之意，同时，希望对频发之不法不信行为，彻底的膺惩是正之，以永远确保东亚全局之和平。”<sup>①</sup>全满记者大会也发表了对日军的感谢文，对于“为安定时局”的日军“表示深甚敬意”。<sup>②</sup>诸如此类的感谢电文充斥着报纸篇幅，其舆论导向显而易见地就是要求日本国民和中国沦陷区的民众全力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而这些舆论总动员是伴随着日本的军事布署同时进行的。当舆论完成统一之时，日本的军事总进攻也就开始了。但在战争之初，由于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稍有变更，即由士兵失踪改为不法射击，打乱了日本人既定的宣传布署，其新闻报道漏洞百出，反倒为我们今天研究七七事变的起因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作者王晓岚，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

戴建兵，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① 《盛京时报》7月20日第二版消息：“对华北日军 奉天联合町会发送感谢文”。

② 《盛京时报》7月30日第二版消息：“全满记者大会宣言及决议”。